

Analyses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for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的 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杨善华 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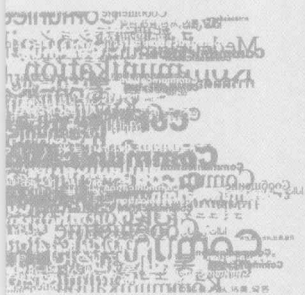
杨善华：田野调查中被访者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alyses of 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 for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的 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 谢立中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ISBN 978 - 7 - 5097 - 1361 - 7

I. ①日… II. ①谢… III. ①现象学 - 分析②社会学 - 分析
IV. ①B089②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9569 号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主 编 / 谢立中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责任校对 / 刘宏桥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3

字 数 / 20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361 - 7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学术创新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所在，而且也是一个教学科研机构的生命力所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就始终把学术创新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之一，力求在继承前人优秀的学术遗产，学习、吸收、借鉴和改造当代海内外同行优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学术创新来提升自己的教学、科研水平，缩小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跟上学科发展的步伐，使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始终能够处于本学科发展的前列，为本学科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们已经创作出了一批有一定原创意味的学术成果，其中有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本系（所）的标志性成果。此外，还有一批从学术创新方面来看富有潜力的研究正在进行中，其中不少研究将来产生的成果也有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标志性成果的可能。为了使这些具有一定原创性、标志性的学术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积累、流传和检验，我们拟自今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丛书，将这些学术成果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代表性文献（包括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成果本身、反映这些成果学术或社会反响的相关文献，以及对理解这些成果有帮助的相关文献等）收集起来，分辑出版。初步考虑每辑以一个专题为主，辅之以某些相关的文献，篇幅

在 20 万字左右。

“现象学社会学”是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取向之一。在中国社会学界，深入探讨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文献鲜有所见，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情景之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来从事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则更是凤毛麟角。近年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及其学术团队以“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为旗帜，自觉地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在海内外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辑选用了该学术团队的代表性作品 9 篇，以期使读者对该团队现有的学术成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本书的前三篇论文主要概括了该学术团队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现有的理解，其他几篇论文则主要反映了该团队成员运用“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视角对中国社会进行经验研究时取得的一些成果。除此之外，本书还收入了两篇由本系作者撰写的与现象学社会学相关的研究论文，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杨善华教授倡导和实践的“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模式。

目 录

CONTENTS

专题：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3 /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 孙飞宇
24 / 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	杨善华
39 / 田野调查中被访者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	杨善华
54 / 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杨善华 刘小京
71 / 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 ——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杨善华
76 / 日常生活政治化与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 ——以宁夏 Y 市郊区巴村为例	杨善华 柳 莉
91 / 夫妻关系“定势”的型塑、维护、突破与权力策略 ——对家庭权力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	郑丹丹 杨善华
114 /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的解读	杨善华 朱伟志
130 / ICT 产品的应用和白领的“白领化” ——一个日常生活的视角	杨善华 李 静

其他论文

151 / 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	孙飞宇
219 / 社会行动的意义：三种模式的比较	谢立中

专题：日常生活的现象学 社会学分析

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

杨善华 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本文着重从意义关联的角度讨论社会科学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法。从深度访谈的性质出发，本文尝试分析了与访谈有关的诸种意义体系，并讨论相关的访谈方法。本文主张，访谈既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同时又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的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的结构为结构，以发现问题，追究问题，最后再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访谈将不仅仅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且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深度访谈 意义探究 日常生活 生活史

一 问题的提出：“深度访谈”的实质

“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深度访谈，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Hakim, 1987; Arksey & Knight, 1999; Wengraf, 2001）。汤姆·文格拉夫（Tom Wengraf）

^{*} 此文是我们课题组集体多年实践的结晶。在此，首先要感谢课题组的刘小京、程为敏和罗沛霖教授以及彭钢施、宋婧等同学，文中不少观点来自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参加调查的同学的发言。他们对此文的产生贡献良多。

^{**} 本书各篇文章所署作者单位均系文章发表时作者所在单位。

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joint production）”；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 2001: 3）。

关于第一个特征，文格拉夫指出，访谈员事先所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在访谈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预先无法计划的，因而，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 2001: 5）。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在事先的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并在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 & Knight, 1999: 7）。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 1987: 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即所谓“要深入事实内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何谓“深度”？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关于“深度”，文格拉夫提出了两个方面：①“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②“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看起来简单、直接的事情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以及“表面事实”（surface appearances）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 2001: 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如果考虑到格尔兹所强调的“深描”（格尔兹，1999）就会发现，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 1976）。换句话说，所谓“深度”的问题，是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而深度访谈的实质，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构成。如果不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做详细的讨论和清晰的认识，也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兹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首先应该掌握它们，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的概念系统来完成的。换言之，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格尔兹，1999：18）；然后再将所得到的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所谓深度的事实，从意义的角度来说，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在访谈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凯瑟林·哈克姆（Catherine Hakim）的观点：“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accounts）……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于自我指向（self-directing）的个体。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任何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解释。”（Hakim, 1987：26）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就意义的角度而言，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

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① 访谈资料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或者根据我们深度访谈的实践可以这么说，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因此，一般说来，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话语）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此外，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因为这样的场景同样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某种意义的，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我们实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于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取资料的过程中，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将自己的意义体系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被访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程为敏，2003）。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也就是说，

① 虽然后来舒茨对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 Schutz, 1972），比如，认为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等，但是从我们经验研究的实践来看，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做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深度访谈的实质出发点。

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但同时也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 observer），同时具备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成为可能？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问题也同样存在，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向”（Schutz, 1962: 158）。社会科学观察者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也非如此不可，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了。要完成一个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世界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Schutz, 1976: 17）。所以，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就不能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作为常人的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

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①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便可以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而这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与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的疏离关系的基础上，来获取足够“深度”的知识？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阿科瑟（Hilary Arksey）与奈特（Peter Knight）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渐进式聚焦法”（progressive focusing）。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集中展开。因为在访谈中，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在访谈中，这种半结构式的、开放式的谈话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Arksey & Knight, 1999: 18）。文格拉夫也认为，被访者一般的兴趣都在于自身生活史，而这正体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定性研究的一个现象，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史转向。

二 叙述的意义

所谓渐进式聚焦法中的一般兴趣领域，就是被访者的日常生活领域，从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来展开访谈。这

① 意义的探究是现象学和诠释学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在这里回避了意义的探究为何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它的解答涉及人的认识何以是可能的这一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为本文之力所不逮，因而本文只将如何在深度访谈过程中进行意义的探究作为主题。于此，我们还要申明的是，虽然我们强调在访谈开始时研究即告开始，但是这并不排斥在访谈结束后我们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探究，对于研究而言，这同样是必需的。

里的日常生活，包括被访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彼此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除了作为我群关系^①的双方都处于同一个地方性历史的自然态度之下，共享同一个时空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们会以社会行动来应对他人转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原因动机（because motive）。^② 由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者总是处于一种互动的意义脉络之中，所以对于彼此的理解可以得到即时的检验与纠正。这是与社会科学观察者非常不同的一点，但同时也正是社会科学观察者的进阶。被访者所“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也是访谈研究得以更进一步的基础。如前所述，我们主张研究者在访谈的开始阶段与被访者共同建立“地方性文化”之情境的原因也在于此。在注意渐进式聚焦法的同时，我们还主张将话题更多地引向被访者的生活史。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史一般都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

-
- ① 我群关系说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在自然态度下，最切近的、最熟悉的行动首先是与他人的面对面的联系。面对面的情境指的是行动者直接面对面的互动，它的本质是同时性与同空间性。在面对面的情境中，互动双方的他人取向同时为对方。这就是直接经验的社会关系，也就是面对面的关系，即我群关系。在我群关系中，我们处于同一情境中，彼此可以接触，双方的意识流通过语言、动作，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符号纠缠在一起，我们“共同成长”，经验到彼此的客观意义与主观意义并不断进行印证与纠正。也就是说，我会通过你的反馈来对我的意识经验进行“注意修改”。我们生活在共同的主观意义脉络中，彼此可以直接经验。
- ② 舒茨对于行动动机的分析得到了两种时间向度上的结果。一种是指向未来的动机，行动依此而指向一个在想象中已经完成的行为，换言之，行动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这样的动机就是目的动机（in-order-to motive）。这里的计划行为指向过去某个类似的经验，也就是手头的库存知识所提供的经验的再生。“每一个目的动机都预设着一个经验存储，并被提升为一种‘我能再做一次’（I can do it again）的状态”（Schutz, 1972: 90）。第二个是指向过去的真实的原因动机，它与目的动机的差别在于，前者根据计划来说明行为，而后者以行动者的过去经验来说明计划。我们可以用一个中国的俗语作为例子：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其中，行动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乃是对于“井绳”的惧怕，随之还有与之相关的躲避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动机也即行动者的目的是因为担心那是一条蛇并且担心被咬到，原因动机则是过去遭蛇咬的经验。

助于我们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达到深度访谈之“深度”，因为“生平阐释（biographical-interpretive）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its ability to explore latent levels of personal meaning）”（Chamberlayne, Boornat, & Wengraf, 2000: 9）。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就必须将其与生活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这样的意义追寻路径，是以现象学传统为其理论基础的，正如麦克·鲁斯汀所说，“现象学传统一直都是社会科学中生活史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Rustin, 2000: 34 - 52）。在舒茨那里，个人行动（action）的意义在于反省的掌握和与生平情境（biography situation）的关联。将行为（act）本身作为一个意义脉络，可以发现其中的意向行为、行动的执行，以及手头的知识库（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在此知识库之下，每一个当下之后的经验，都会处于一个整体的意义脉络之中。每时每刻，这一意义脉络亦即经验，会以各种视角来面对世界并加以解释；任何人的每一个当下时间，都持有他自己的种种经验与规则，即经验图式（schemes of our experience）。“经验图式是一个意义脉络，它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轮廓，概念性地包含着可于后来发现的经验客体，但不包括它们的构成过程”（Schutz, 1972: 82）。生活史叙述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追寻被访者行动的原因动机，从被访者的经验图式中，也即他的生平经验中来理解他当前的处境、行动、态度，以及他赋予所叙述材料的意义。将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放入被访者的生平情境中，才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的理解，才能发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故事，也才能够为每一个访谈对象建立起一个立体、鲜明的形象，并与其他的人真正区别开来。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叙述中发现日常生活行动的文本情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Widdlershoven, 1993: 2）。

在有关生活史的访谈中，异常事件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所谓异常事件，就是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与常态不符的事件。被访者一般都会对此类事件记忆深刻，从而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我们在访谈中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故事。叙述学家们（Narratologist）认为，故事的讲述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调适（adjustment）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访者讲述故事，并非只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它们还是叙述者构建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Andrews, et al., 2000: 78）。叙述中的故事并非无意为之，通过对过去的故事的叙述，被访者可以达到一种“叙述性的自我认同”（narrative identity）（Widdlershoven, 1993: 20）。一般说来，普通人的经验只有在与“故事”交融在一起的时候才会获得意义。通过被访者生活史中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反思、决断以及行动，而这些对于理解行动者的意义都是很关键的（Rustin, 2000: 49）。通过被访者在访谈中对于故事的拣选、讲述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被访者想要赋予故事的意义，他曾经的、现在的以及想要成为的身份认同及其中隐含的意义。而我们又可以借此来刻画被访者在地方性文化社区中的身份和日常形象。

但是我们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在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的研究中，我们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能够获得一种普遍化的知识。对在更为宽泛的范畴之上来讨论个人生活史意义的做法，向来存在着争议。如凯瑟林所指出的，定性研究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所获数据的有效性，但与之相应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代表性。阿科瑟与奈特也认为，深度访谈的目的是获取意义，样本应当更少一些，而普遍化则并非研究者的主要目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正式的系统是在与非正式的文化和结构的互动中，以及通过个体的生活与策略体现出来的”（Chamberlayne, Boornat, & Wengraf, 2000: 9）。对个体的理解包括“意义的归置、